

范晔

之人格与风格

FANYE ZHI RENGE YU

钟书林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范晔

之
人
格
与
风
格

钟书林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范晔之人格与风格/钟书林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5004-8619-0

I. ①范… II. ①钟… III. ①范晔(398~445)-人物研究
IV. ①K825. 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0264 号

责任编辑 郭晓鸿(guoxiaohong149@163.com)

特邀编辑 王冬梅

责任校对 王兰馨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7.25 插 页 2

字 数 231 千字

定 价 2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第一读者的感受

魏耕原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两汉风俗”条，对东汉所论尤为深切：“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东汉政治以昏暗著称于史，顾氏拨开昏浊，而对“党锢”、“独行”之士人，推波助澜而形成的不可阻止与扭曲的世风，极加推美誉扬，确能醒人心目。此言二者之相反，又言世风对政权之维系：“范曄之论，以为‘自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所以倾而未颠，决而未溃，皆仁人君子心力之为’可谓知言也。”由此可见，顾氏之论，实是对范曄《后汉书》史论的抉发，亦是心悦诚服之首肯。

较之《史》、《汉》、《三国》三史，范书自具个性，不仅著述一代之史，意在“正一代得失”，亦可作一代思想史观。在艳称的“前四史”中独呈一道亮丽的风景。同样可知，范书文字的精彩未在将相传，似乎聚集于他所独辟的《党锢》、《独行》、《逸民》传中。他还特意新辟《宦者》、《文苑》两大类传，前者为东汉症结，后者则揭示了文学将走向自觉时代

❖ ❖

的思潮趋势。而《方术列传》则展示道教萌发与谶纬盛行的蓬勃之势。还有《列女传》为女性专设一人物画廊。以上均为早于范书的前三史所无，开后世之法门。

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说“常耻作文士”，这实为善文者的自信，近似扬雄“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的用意。这从下面的话可看出来：“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这在以词为主的六朝真是空谷足音，高屋建瓴之论。他的“耻作文士”，实是对当时文风的不满：“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绩，竟不得也。”观乎此，即知范史之精神所在。

范史有两大闪光之处：一是合传与类传；二是序、论、赞。对于前者，他认为“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范史撰于18家后汉史之后，学如积薪，后出转精，必然之理。故又言：“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耳”。对于后者，以为班书“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故又“称情狂言”：“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此言其论。至于赞，则言：“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无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以今观之，其序、论似更出彩。《文选》选录《皇后纪论》、《二十八将论》、《宦者传论》、《逸民传论》，以及《光武论赞》，则范氏自评不为虚妄。

刘宋在南朝可算个张扬自信的时代。书家张融对君主有言：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而无臣法；诗文亦有健拔者，元嘉之雄谢灵运，遒劲轩翥者如鲍照，均出其时。所以范晔谓己著“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思精，未有此也”。前四史的定位，可算是对其“狂言”的认同。

有鉴于此，故应看重范书。加上文学研究往往重诗轻文，所以当钟书

林同好读博，从我读书研究伊始，就萌生此意。

钟君为人谦谨，思敏而向学，从我读硕时就对《世说新语》下过细读之功，作过不少札记。当商定博士论文选题时，即意在《世说》，可谓情有独钟。范书白文，字数不下百万，要在通常完成博士开课学业与科研论文规定“任务”的几篇核心刊物论文后所剩一年内，投入一部大书研究，确属一大难题，而且中文专业的课堂向来不专讲范书。然治学就重弃轻，取大去小，属于向上一路。且《世说》时贤论著甚夥，要独辟一径，亦非易事。范书时下备受寂寞，从文学着眼者寥若晨星，这正是“于无佛处称尊”的好去处。我便千方百计怂恿，竭力鼓动。他处事谨慎，经过半年还要多的不知多少次讨论，这也是他急读范书的时候，终于铁了心，取径于此。

就在这时，他唯一至亲——慈母突然见背，丧亲之恻，难以述言。他是面对慈亲遗容完成毕业论文的。悲痛化为力量，这或许是最好的回报。那时他还是西安一所高校文学学院的教师，每周几节课自是难免。人憔悴了，消瘦了，论文终于成型了。

撰写前，我强调对结构与序论要下工夫，诸如序论中虚词的用意，要下些工夫，要对刘知几《史通》，以及赵翼、钱大昕、王鸣盛著作留心，若有余力要翻翻王先谦《后汉书集解》，至于李景星《后汉书评议》则最为管用。清人学术笔记也不要放过。至于行文风格，修辞运用也都有要求。还有什么苛求，现在也想不起来，不知给钟君加了多少负荷。

他真是鼓足了力气，拿出来五十多万字的论文！全面展开讨论，诸如时代风气、思想用意、结构体系、叙事方式、写人艺术、语言风格、论赞的文学风采，以及与《三国志》的比较，还有文学地位和影响。其中结构、叙事、语言分析三章，最能见到作者用心所至。论赞部分，他说没有写好。依我看，其中的虚词的运用，尚无人涉及，这已很不容易了。他的研究是从文学出发的，前人多于史学用功，故多少带有筌路蓝缕的性质。论文涉及范围甚广，不少地方讨论得很细致，时遇精彩处，让人欣然会心。比如，言及袁绍作战一节，就颇有识眼。对《范滂传》这样的名作，

论析亦见精读深思的功力。

作为第一读者，我读了首章，觉得先要再通读原著一遍。费时近月，并有圈画旁批，把它交给作者翻阅，以资思考修改。然后对其余各章详读，详批，目的以臻更好。然后详细交流了感受并给出修改意见。作者果然不负所望，花力气修润、改动、调整、删补。故在外盲审时，五位专家，赫然获得四优，赞语有加。在答辩会上得到一致好评，主席詹福瑞先生更是热心支持。

我们学院在推荐优秀博士论文时，经过筛选，其作被列为两篇之一。学术为天下公器，时下学界尽管有许多干扰，然学人心中有眼，读者自有公论。作者毕业已快两年了，又依据外审和答辩会上的意见，对论文作了不少修改。最近将要出版，因原文长，内容又稍各自有侧重，故分作两部，一曰《〈后汉书〉文学初探》，二曰《范晔之人格与风格》。作为第一读者，作者要我说几句话，师生之谊，辞让不得。只好强作解人，以言其文始末，以及其中甘苦。就在此前，作者一篇考据论文，又为《文学遗产》将刊用。去年春申报的国家项目，是关于敦煌文学的研究，又一举成功。近三年来又连续获得省教育厅与西安市几种级别性的奖项。这也说明用心人，好事连绵。

值得一提的是，现在要求在读博士必须发表核心论文数篇，实在不见得科学。即就是无此，埋头读书三年，拿出数十万字论文，也非易事。他们多是30岁不到的由学生到学生的博士生。而文科需要积累，至于研究，更需要磨炼，这要时间。复旦大学一毕业多年的博士说，文科博士毕业没有十年或二十年的努力，恐怕不会有成。这是实话。总之，治学无论老少，都松懈不得。愿与作者共勉！

拉杂言之，不觉已长，聊且以为序。

2009年3月

于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目 录

序	魏耕原 (1)
绪论 范晔人品之争议	(1)
第一章 范晔与他的时代	(4)
第一节 1—5 世纪文士的史学意识	(4)
一 “文学自觉时代”命题的提出与质疑	(4)
二 文学地位的尴尬与史学的救赎	(6)
三 史书与六经俱传的经典性	(14)
第二节 讖纬播炽与儒学危机	(20)
一 讖纬的兴起与东汉政权的建立	(22)
二 讖纬与东汉国家政治	(24)
三 讖纬光照下的儒学危机与范晔的史学救赎	(26)
第二章 范晔的切身痛苦及其史书的撰作	(29)
第一节 范晔的儒家身世与对忠义之士的企羡	(30)
一 范晔的家学渊源和他的儒学情结	(30)
二 景慕儒学忠义气节之士	(34)

❖		❖
第二节	寄意于史,发自我之幽情	(39)
一	才士不幸的抒陈	(40)
二	爱慕奇才异士	(47)
三	君臣相知的渴羨和哀婉	(55)
第三章	范曄的生命体验与传记人物的书写	(63)
第一节	《后汉书》对复杂人性的把握	(63)
一	“神格”、“道德格”史观向“人格”史观的转变	(63)
二	《后汉书》人物性格的发展性与流动性	(66)
三	对传主“为人”的关注	(77)
第二节	类传中人物形象的塑造	(79)
一	士林的楷模:党人	(79)
二	佞臣:宦官	(83)
三	文人	(85)
四	独行异士	(89)
五	智慧与荒诞:方术之士	(92)
六	逸民	(94)
七	贤媛和惠童	(97)
第三节	《后汉书》写人的方法	(102)
一	对传记人物的对比关照	(102)
二	以细节传神	(106)
三	通过行动、言语展现人物内在心理	(112)
第四章	范曄的爱憎识断与《后汉书》论赞	(117)
第一节	论赞的文学特质	(119)
一	论赞的文采	(119)
二	论赞的情感和风骨	(127)
三	文如其人:论赞的文风	(151)

目 录

❖	❖
四 论赞的音律之美	(158)
第二节 论赞的思想和价值意义	(161)
一 参悟人情世相与生活哲理	(161)
二 朴素的辩证思维	(165)
三 困惑的天命观	(168)
四 弥补纪传正文记载的不足	(169)
五 论赞的序论和史论价值	(173)
第五章 《后汉书》的春秋褒贬与《三国志》之比较	(179)
第一节 《后汉书》《三国志》比较研究概说	(179)
一 “三史”“四史”之说与陈范优劣之争的开始	(179)
二 清朝的陈范异同比较研究	(181)
三 近现代的陈范异同比较研究	(187)
第二节 《后汉书》《三国志》异同比较	(189)
一 叙事风格比较	(191)
二 语言比较	(203)
三 史法比较	(209)
四 《后汉书》不及或照搬《三国志》之处	(216)
五 《后汉书》《三国志》异同比较综论	(221)
第三节 《后汉书》与《三国志》裴松之注	(225)
一 《后汉书》与裴注运用相同史料的比较	(225)
二 《后汉书》运用的史料超逸裴注之处	(229)
附录 范曄年谱	(232)
后记	(263)

绪论

范睢人品之争议

在中国古代史学家中，身后争议最大的莫过于范睢。然而，蒙受冤屈最大的也莫过于他。

朱光潜先生说：“人品与文品的关系是美学家争辩最烈的问题。从一方面说，人品与文品似无必然的联系。”“艺术的活动出于直觉，道德的活动出于意志；一为超实用的，一为实用的，二者实不相谋。因此，一个人在道德上的成就不能裨益也不能妨害他在艺术上的成就；批评家也不应从他的生平事迹推论他的艺术的人格。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言为心声，文如其人。思想情感为文艺的渊源，性情品格又为思想情感的型范；思想情感真诚则文艺华实相称，性情品格深厚则思想情感亦自真诚。……因为他们的一篇一什都不仅为某一时会即景生情偶然兴到的成就，而是整个人格的表现。不了解他们的人格，就决不能彻底了解他们的文艺。”那么，到底哪一方面更占据优势呢？朱先生又说：“古今尽管有人品很卑鄙而文艺却很优越，究竟是占少数，我们可以用心理学上的‘双重人格’去解释。这种双重人格究竟是一种变态，如论常例，文品表现人品是千真万确的

事实。”^① 文品常常联系着人品。所以，古往今来，人们品读《后汉书》时，眼前仿佛总是浮现着范晔谋反受诛的狰狞面孔，总是回荡着他谋反受诛前对妻子的阴阳干笑。有这种心理患症的人，还为数不少。

唐诗人顾况说：“《周语》之略曰：‘孝、敬、忠、信、仁、义、智、勇、教、惠、让，皆文也。’……范蔚宗著《后汉书》，其妻不胜珠翠，其母唯薪樵一厨，于家如此，不得谓之有文。”^② 盛元梓说范晔“是为不忠不孝之人，后世乃读其《后汉书》，安得大手笔重为修纂，削其名可也。晔之诛不足以塞其罪”^③。《郡斋读书志》、《闻见后录》都记载说北宋“神宗皇帝尝恶后汉范晔姓名，欲更修之”^④。胡应麟也称范书是“乱人之史也，而史之得失，文之高下了然矣”^⑤；《南园漫录》说“盖晔极无行义之人也，何能深探哀怨发中之旨哉”^⑥。苏东坡嘲讽“范晔之论班固也，以为目见毫毛而不见睫”，却不能自逃于目睫之论。^⑦ 连思想较为开明深邃的王夫之，对范晔的评价，也仍没有能够走出“文人无行”的阴影^⑧。他们因噎废食，因人废书的偏见，给《后汉书》的传播和范晔的声誉带来极大的破坏。所以，要想肯定范晔及其《后汉书》，就必须先替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① 朱光潜：《谈美 谈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34 页。对于“文如其人”话题的研究，蒋寅先生有鸿文：《文如其人？——诗歌作者和文本的相关性问题》（《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中华书局 2003 年版，第 181—199 页）。钱钟书先生也有所谈及，见其《管锥编》第 4 册，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1392 页。

② （唐）顾况：《文论》，（清）董诰等：《全唐文》卷 529，中华书局 1982 年影印本第六册，第 5375 页。

③ （元）盛元梓：《庶斋老学丛谈》卷上，丛书集成新编本。

④ （宋）晁公武著，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 5，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

⑤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 13 “乙部”，上海书店 2001 年版。

⑥ （明）张志淳：《南园漫录》卷 8，丛书集成续编本。

⑦ （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 7 “策问”，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205 页。

⑧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 15 云：“谢灵运、范晔雕虫之士耳，俱思蹶然而兴，有所废立，而因之以自篡，天子若是其轻哉！”卷 16 又云：“虽然，又岂若范晔、王融、祖珽与魏收之狂悖狠鄙乎？谚曰：‘文人无行。’”

被钉在耻辱柱上，饱受斥责千百年，范曄终于迎来了他的“普罗米修斯”——王鸣盛。王鸣盛力辟众论，说范曄“正所以表死节，褒正直，而叙杀身成仁之为美也。而诸列传中亦往往见重仁义、贵守节之意。善读者当自知之，并可以想见蔚宗之为人”，“蔚宗与甥侄书，自序其读书作文之法甚备，甘苦蕴味，千载而下，可以想见”。又说：“今读其书，贵德义，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褒党锢则推崇李、杜，宰相多无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唯尊独行，立言若是，其人可知，犯上作乱必不为也。”^① 他非常气愤北宋以来对范曄《后汉书》的轻视，并开始为范曄平反，从此范曄及其《后汉书》的遭遇，如乌云拨日，走出阴霾时代。

以后的陈澧、李慈铭、戴蕃豫等先生，又陆续为范曄正名^②。戴蕃豫先生曾经动情地说：“宋以来学人，喜摭拾一二琐事，以资口给”，“而唐宋以降，轻肆讥评，固知曲高者和寡，道隆者谤重，流俗议论，乌足以衡量范氏乎？”^③ 所以，为范曄平反，对范曄是否谋反的争论，便成为清代以降，《后汉书》研究中一道耀眼的景观。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各执一词。

对此，笔者以为，与其就范曄是否谋反而争论，不如更多地关注《后汉书》本身。还是吴见思说得好：“苟因文诛意必以圣人为准。因而是非其人，以是非其人。彼三代而下，无完人，斯无完书矣。故知以是非论是非，不若以文论文之为得也。”^④ 职是之故，本书从《后汉书》入手，试图打开对范曄人品解读的另一扇窗户。

① （清）王鸣盛著，黄曙辉点校：《十七史商榷》卷36、61，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487页。

② 如张述祖《范蔚宗年谱》引陈澧《申范》及傅维森《读宋书范蔚宗传书后》、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等。关于这些，程方勇先生《范曄及其史传文学》有详细论述，中国社会科学院2003年博士论文，第26—34页，请参看。

③ 戴蕃豫：《范曄与其〈后汉书〉》，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第39、52页。

④ （清）吴见思著，陆永品点校整理：《史记论文序》，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第一章

范晔与他的时代

第一节 1—5 世纪文士的史学意识

文学总有殊不易理解之处。刘宋史学家范晔自诩《后汉书》的序论笔势纵放，为天下奇作，不减贾谊《过秦》之篇，比肩班固《汉书》而毫不逊色。这般高标自恃的文才之士，却自称常常耻作文士，无意于文名^①，令人大惑不解。为解读这个谜团，本书试着从解读“文学自觉时代”的观念切入，来探析范晔耻作文士的心理。

一 “文学自觉时代”命题的提出与质疑

自鲁迅先生指出，曹魏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种说法一直被学界奉为主臬，不断得到补充、

^① 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宋书》卷 69《范晔传》，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830 页。

完善。

当然，也不乏有人对此作出委婉的修订甚或否定，以两种意见比较典型。一种意见是将文学的开创时代前移至东汉，认为东汉已经开始步入文学的时代，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蓄积力量。^①另一种意见认为曹魏时期经学始衰，但带来的不是文学的自觉，而是子书的著述蔚然大兴。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中综述了诸多前贤的一些看法。^②对鲁迅先生的说法，明确表示质疑和否定的，有王运熙、杨明^③、罗宗强^④、刘跃进^⑤等诸位先生。

拙文无意于对鲁迅先生以来的各家说法是否各执一端，互有偏废作出评判。但是有一个人们所熟知的事实：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宋文帝设立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学。（《宋书》卷93《雷次宗传》）四学地位的确立，成为它们最早定位的标志，也是经、史、子、集最早的整体定位。四者之中，成熟最早的当然是经学，其次要算史学、子学，文学最末。在被定为四学之前，可以说文学仅仅停留在自发或半自觉的层次，没有真正摆脱过束缚，而是处于黏附在经学、史学甚至是子学上的被动或半主动状态。但是，这种不独立的生存方式，并不等于没有文学的存在。文学在经学昌盛的汉武帝、光武帝、明帝等时代有，在经学衰微的魏晋时期也有。只是在刘宋时代以前，几乎很难找到一个纯粹的文学家。它们总是黏附在经学家、史学家、子学家（思想家）这些人们公认的社会身份之上。所以，后世常常称道的文章家，其实就是这三类。当然，也有帝王家身杂文士的，曹魏时期最为典型。在这三类中，只有

① 蓝旭：《东汉士风与文学》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② 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12—118页。特别需要致谢的是，拙文本节的有些思路和想法，是因拜读胡先生鸿著时而有所感发的。

③ 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5页。

④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7页。

⑤ 刘跃进：《门阀制度与永明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2—14页。

史学和文学的距离最近。经学家的文章不免道德气太重，殊乏文采，两汉的经学繁琐，人们对赋以外的文体很难擅长。子学成熟较晚，相较于经学、史学，资历尚浅，社会认同度仍然相当有限。所以史学成为文士们的首选，借史学而成一家之言，是文学步入四学之前，文士们展现自我生命价值的主要形式。

总之，文学在步入四学以前，没有获得摆脱政治、教化等而独立存在的社会身份，也就不可能有社会认可的名正言顺的纯粹文学家存在。而这些展现文学自身的审美价值，使其获得独立发展的外部条件一旦不成熟，通常所说的“文学自觉时代”也就不可能过早地出现。

因而，在这个意义上，结合范曄的耻作文士的心理，我们有必要梳理在元嘉十五年——公元四三八年之前“文学”所走过的蹒跚历程。结合对“文学自觉时代”历来的理解，有学者上溯至东汉，因此本书择取一至五世纪为时间段，解剖文学与史学这一粘连体，希望能对重新理解“文学自觉时代”有所帮助。

二 文学地位的尴尬与史学的救赎

文学被鄙为倡优小道，西汉以来论者颇多。司马迁在《史记》中，将文学家东方朔置于《滑稽列传》，与倡优同传。因为在司马迁看来，在世俗人眼里，“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报任安书》）。这一点，到了扬雄时代，仍然没有多大的改变。身以辞赋而名世的扬雄，却把辞赋看做“童子雕虫篆刻，壮士不为”（《法言》）。

至东汉，汉章帝雅好文学，外戚窦宪扬其余波。班固、崔骃为汉章帝、窦宪最激赏的文学之士，但班固“二世才术，位不过郎”（《后汉书·班固传》），崔骃以白衣终老。到了灵帝时代，创立鸿都门学，选用拔举文学之士，但却遭到了杨赐、蔡邕等士君子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有类俳優”（《后汉书·蔡邕

传》),“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后汉书·杨赐传》)。这种观念,即便到了“文学自觉时代”的伟大旗手——“建安之杰”曹植,仍没有太大的改变。

曹植在其《杨德祖书》中说:“辞赋小道,固未足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衰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文选》卷42)对于曹植的这种观念,前人有过不同的理解。鲁迅先生认为是自伤遭际的违心之论^①,罗宗强先生认为,“显然是看不起文学,且连述作也颇为轻视的”^②,两人看法并不一致。笔者倾向于罗先生的说法,详见下文。

两晋似乎没有公然视文章为小道的言论,但在西晋才士命促,“人未尽其才”(《文心雕龙·时序》),东晋玄风煽炽,文学殊不景气,史学著述却极为绚丽多姿,甚至画出了六朝时空里最光彩夺目的一笔。这种文学低迷而史学骤兴的反差,不能不带来文学的尴尬和人们的沉思。刘宋时期,仍然有范晔等公然表示耻作文士,无意为文。虽然就在此前不久,文学已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为四学。^③这足见对文学鄙夷的成见之深,文学尴尬地位的阴霾之深。

那么,如前所论,既然文学没有自身的独立,黏附于史学而存在便成了文学获取自身独立地位之前的最佳价值体现方式。史学成为文士们乃至整个文学暂时借以栖息的最好精神家园。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虽然自我伤怀文史星历的倡优弄臣地位,但却在他草创《史记》未就之际,因李陵之祸惨遭宫刑荼毒,这改变了他的人生价值,他将生命熔铸于《史记》,成一家之言,“偿前辱之责”。

①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00页。

②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7页。

③ 元嘉十五年设立四学,范晔作《狱中与诸甥侄书》在元嘉二十二年,前后相差七年。